

范 斯 伯
著 原



日本間諜

SECRET AGENT OF JAPAN

人 神
共 憤
！

文 華 出 版 社

范斯伯
原著

日本間諜

SECRET AGENT OF JAPAN

人神
憤共

文華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原著 范斯伯

編譯 集賢

出版兼行 文華出版社

總經理處

上海牯嶺路八號
美華書局
文華書局

代售處各埠各書局報灘

序言

曾經被邀請給本書寫一篇序言，我就冒昧在此簡單地說明本書出版的經過情形，以及作者范斯伯先生的略歷吧。

一九三六年秋季我在上海初次認識范斯伯先生，那時他來看我，說是他的妻由大連搭船到上海會他，在青島被日本當局扣留，要我幫助他發表這消息。我寫了一個字條，介紹他去見當地辦報的一位同業，不久之後他就消失在我的見聞以外了。

一九三七年尾，范斯伯先生又來見我，他告訴我他作了一本書，敘述他在滿洲被日本特務機關雇用的種種經歷，並且要我指示他使牠出版的方法，我問他為什麼要來和我商量這件事，他回答：「因為你知道這些事情，也因為你和日本人打過麻煩（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和日本當局們發生衝突，因為我反對他們有權檢察我寄給曼哲斯特衛報的通信。）所以我相信我不會拒絕我。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寫了這本書，他們是要立刻打倒我的。現在這書已經完成，我想設法趕快出版，那麼我就可以帶着家眷離開上海。」

我答應考慮這件事，但是暗中咋舌，因為我自己就有一本書要出版，我也知道沒有時間來看范斯伯先生寫出來的那種東西。一兩天之後，他把原稿交給我，我又把牠轉給一位富有批評精神的新聞同業，請他給我一個坦白的答覆。使我吃驚了，我接到一個最熱忱的回信，但是我仍然不滿足，決定再加以檢驗。我把事情說明給一位可靠的朋友，他是外國政府的官吏，因此對於鑑定范斯伯先生的敘述是異常方便的。這位官吏讀過原稿而且仔細研究之後，他問我是否能夠設法使他和作者會見，以便盤問那些似乎需要說明的處所。會晤的方法佈置好了。經過幾次長談之後他相信范斯伯先生所說的都是實情。

他寫信來說：「這裏所描寫的種種暴虐，大多數是我經過觀察而熟悉了的，但是讀着本

書總覺得顯現爲日軍統治新征服地人民的方法的特質的殘酷，腐敗，惡劣，野蠻之深刻，在我這是一種戰慄的經驗。對於自命爲西方文化保衛者的希特勒和莫索里尼，這書是一通辛辣的斥責，我相信，即使是他們吧，倘若他們讀了這書，他們也要驚怖於他們所保衛的這一類東西的。

「對於英國的積習甚深的保守派，以及「他們正在作着的不過是我們曾經作過的」派，這書可以提供一種明白的教訓；對於孤立派的和平論者，這書是一付強有力的消毒劑，使他們覺醒日本對於征服地人民所謂法律，秩序，繁榮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我所讀過的最強有力的公訴狀，控訴某一階級，某一國人，實際也就是控訴「全部不公道的制度，由於這制度使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使千百萬人在黑暗境地中工作以供養少數人的舒服和剝削，而大多數人却不能不生活在污穢和飢餓之中以維持那詭詐的營利方法。」」

因爲要徵求第三者的意見，我把原稿交給我的朋友斯諾（Edgar Snow），西行漫記的作者；他讀了之後，把牠交還我，附加評語：「據我所知，本書所敘述的事件，人物和情境，都具有各種自明的真確性。是一種無可疑地有特殊價值的內幕故事。」然後，我親自逐字逐句地把原稿讀了一遍，以我作曼哲斯特衛報和亞細亞雜誌通信員於一九三三年，三四年和三年歷次旅行滿洲所獲得知識爲標準，加以審核。我敢相信在大體上范斯伯先生的出色的故事是必須認爲真確的。

關於本書就有這麼多的話。讀者當然想要知道一些作者早年的背景：范斯伯於一八八二年生於義大利的阿拉（Aquila）二十二歲的時候，受完教育而且服滿兵役，他到墨西哥去，在弗蘭西科馬德拉（Francisco Madera）將軍部下作軍官。在墨西哥戰役中他兩次受傷，並且升到上尉階級。

據范斯伯先生自述，一九一二年他離開墨西哥，作爲一個自由投稿的記者漫遊美國，南

美，澳大利亞，安南和中國。在他的旅行中到過一些遼遠的地方，西藏，蒙古和東部西伯利亞邊境等。

在世界大戰中，一九一六年間協約國利用了他在中國長途旅行的專門知識，因此加入情報工作，跟隨日本軍隊進入濱海省及阿穆爾省，一直到貝加爾湖和尼古拉夫斯克（註）。另一譯名為「喇衛」。在這幾年間范斯伯先生有異常的機遇會見中日要人，其中之一是張作霖太帥，那時的東三省督辦；所以，大戰以後，在一九二〇年間，他加入了這位滿洲軍閥的幕客之列。從此他變為滿洲政治後台的一個權威。然而，不久，范斯伯先生的新關係使他的本國的當局衝突起來了，因為義國軍火那時正在繼續私運入滿洲，而他的職務是制止這種交易，以維持張大帥轄境之內的治安。為情勢所迫，他決定改變國籍，變為中國人民，以薦人是中東路督辦朱慶瀾將軍，保證人是北滿警察廳長魏永興將軍，中東路警務處長姚志曾將軍。這並不是偷偷摸摸的勾當，而是光明正大的合法行為。因此，他保持了行動的獨立，以及，同樣重要，他的生活方法。不過，縱然改變了國籍，范斯伯先生現在還是范斯伯——一個忠實的法西斯黨徒和莫索里尼的熱心崇拜者。

一九二八年張作霖大帥被日本特務人員謀殺了之後，范斯伯先生忽然又遭遇一次生存鬥爭，然後從事於各種商業。但是，一九三二年間，這些日本人作了滿洲的主宰，同時也就變為范斯伯先生自己的命運的主宰。他們要挾他來替他們作事，簡直以危害他的家屬相恐嚇。於是范斯伯先生變為日本特務機關的不情願的工具，這也就是使本書對於現世界有重大意義的理由。從來沒有過，以後或許也不會再有誰處於日本人之下的這種特權地位「宣佈其中的真象」。他所說的是值得我們的注意的，而他本人也是值得我們感謝的，因為他有勇氣發表他的驚人的經歷。使范斯伯先生得以不受義國官廳干涉的變更國籍，到日本佔領滿洲的時候，却使他處於日本人宰治之下了。因為他心愛的人們臨到生死關頭，他不能不忍氣吞聲，硬起心腸，以至屈服，但是他憎惡日本人征服滿洲所用的方法，這種憎惡現在都流瀉於每一

專斷字義行間，被柑制在那種機構之內，他的一切努力都是要救出他自己和他的家屬，以免遭受了他見過別人因為反叛他的新主人的貪殘凶惡太遲而遭受的命運。

范斯伯先生以他自己的奇特無比的方法敘述自己的故事，並無美國人所謂「穿鑿」（“Pulling his punches”）。這書是一個個人的故事：他以熱烈的憤慨寫出使他深惡痛絕全體日本人種的那些事件。不過，應該聲明，有些地方，譬如對於武藤大將和尾井大佐之類，他以最高贊詞敘述了一兩個日本官員，因為他們的真純的性格引起他的敬慕。

至於我自己呢——而且我知道本書的發行者們也有這種同感吧——我相信以日本民族全體而論大多數都是勤苦耐勞的人民，很像中國的印度的或歐洲的農民。日本人民是不負他們的軍閥和財閥的罪責的；分析到最後，他們正和中國人民自己同樣是這種惡行的犧牲品。倘若說日本人民似乎幫助着這些暴虐者，那是一半由於他們不懂得正進行着的事的真實意義，一半由於他們的處境迫使他們相信日本的榮譽和橫霸是同一的意義。

H. J. T. 倫敦一九三八·六月廿二號。

目次

第一章 在中國作間諜的開始	一——五
與白奴販賣者戰爭	五——六
我的頂好的上司——張作霖	七——九
第二章 日軍的突擊戰	九——一三
第三章 中國人的悲劇	一三——一七
滿洲的勞倫斯——土肥原	一七——一九
第四章 日本的政策	一九——二四
我的任務	二四——二八
出馬第一砲	二九——三一
第五章 一個可愛的土匪・影	三一——三五
我的長官震怒了	三五——三九
我的五個助手	三九——四二
第六章 軍部所特許獨佔的賣淫業	四二——四七
麻醉政策下的犧牲者	四七——五〇
第七章 自食其果的皇軍	五一——五九

第八章 果報昭彰

六三——六九

第九章 徒勞往返的——李頓調查團

六九——七七

第十章 長官的嘉獎

七七——八一

受寵若驚的一頓點心

八一——八五

第十一章 我作了交換俘虜的專使

八五——八八

我最得意之作

八八——九二

第十二章 皇軍的副業——綁票

九二——一〇九

一段悲慘的故事

九七——一〇三

接了一封警告信

一〇三——一〇九

第十三章 換了一個新的長官

一〇九——一二五

掩耳盜鈴的漂亮事件

一二七——一二〇

錢的搜括法

一二〇——一二五

第十四章 別矣！鐵蹄下的滿洲

一二五——一四〇

懷着一顆不安定的心到了上海

一三三——一三六

妻的脫險經過

一三六——一四〇

最後的話

一四〇——一四三

第一章 在中國作間諜的開始

自一九一六年服務於遠東特務機關以後這幾年間，我熟識了許多中國的文官武將。其中之一是滿洲軍閥張作霖大帥。有好些機會，他認識了我的工作的性質，要我時常報告他在俄國的中國人的實際狀況，並且供給他別的有用的情報，而我總是高興傳送給他的。他屢次通知我倘若我決定留住東方，他是喜歡我替他作事的。他的提議是動人的。我估量了一般情況。大戰後歐洲的殘破情形使我決定接受這邀請，因此，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四號我加入東三省督辦張作霖大帥的特務機關。大帥要求我的第一個條件是不能使任何人知道是替他作事的，除了黑龍江省長吳俊陞而外，因為他是他的最親密的朋友，要我時常向他請示，而且要我使人相信我是還在我的本國和協約列強指揮之下的。（註）在世界大戰期間我被協約軍情報處雇用，活動於滿洲，蒙古和西北利亞。）

我很少去謁見瀋陽的張大帥，要去的時候必須在夜幕之下，穿着中國服裝，帶上黑眼鏡，把歐式的呢帽檐遮在眼睛上面，並且由他的一個心腹的副官引導着。我替張大帥工作了八年，而且這使我歡喜得要說我常常覺得他是一個光榮而且英武的男子。說得到作得到，他是一個忠心服務的人們的好上司；對於犯法背信的人們很嚴厲，他處置叛徒是毫不容情的。

在俄國，在蒙古，在高麗，和在中國的這些年代，我用各種姓名和各種護照進行我的工作。這全是幹這把戲所必需的手段。我的任務是各式各樣的：收集政治情報，監視別國的間諜，緝捕土匪，軍火私販，毒品私販，和白奴販賣者（這些販賣者輸出過幾千逃避革命的俄國年輕女人）以及制止蘇俄的和日本的活動。因為適應環境，有時我必須專心經營各種職業和貿易，例如，蒙古金礦或煤礦調查專員，中國政府特派復興俄滿商業交通調查團的秘書，憑着這種資格我於一九一一年三月七號乘了第一次通車遊歷俄國；一九二二年，我是俄滿邊

界重鎮滿洲里的一家中俄合辦的報館的編輯；後來又在外蒙古的烏朗巴都（即庫倫）作幾家報館的通信員。一九二三年二月我奉命調回瀋陽，要我調查偷運軍火，那時這種私運是具有嚴重性質的。

最初兩個月我逗留在山海關，秦皇島以及津奉路各地，不久我的努力就得到了收穫。三月二號我初次沒收私運的五百枝步鎗。這些鎗證明全是義大利造的，當他們在離山海關九英里的地方偷過長城的時候，我捉住了他們。三月二十二號我又捉住了一千枝來福鎗，而且四月十二號我的夥伴在北戴河附近沒收了二百枝義大利造的自動手鎗。四月二十七號，在離海岸線較遠的地方，又捉住一批帶着二千枝來福鎗的私販子。這些鎗全是運給滿洲土匪的，土匪們正在使張大帥的事業增多困難，因為要提高生活水準和繁榮國家必先恢復法律和秩序。

因為我的活動結果使公衆和有關列強都知道了，當六月間我到天津的時候，我就到義大利總領事加布勒里的邀請，要我去見他。我去了，他問我在天津幹些什麼事情。我回答我正在一次愉快的旅行之中。他插嘴道：「不要對我說廢話，我很知道你在天津幹什麼，但是我警告你，你固然可以從中國當局方面得到某種有力的證明文件，然而你總還是在我管轄之下的義大利人，倘若你再弄什麼麻煩，我就毫不遲疑地拘捕你，遣送回國。明白了吧；我沒有別的話講。」我毫不吃驚地接受了這恐嚇。然而，我必須盡我的職責，並且決定這樣忠實地執行，不管犯罪的是什麼國籍。

在那一年夏季，我所沒收的東西之中有幾千枝來福鎗，手鎗等等，還有二百公斤嗎啡和海洛因，以及一千五百公斤鴉片。最後，十一月十四號，得到日本當局的同意和我的中國上司的支持，我去到停在天津的一隻日本輪船上，沒收了大約四千枝義大利造的來福鎗。這些鎗是要運到廣東去的。第二天我看見當地報紙上登載着義國租界警務署長簽名的通告，我好笑了。那通告上說：「在日本輪船上察獲而為中國當局所沒收之軍械雖係義大利製造品，但

並非自駐津義國海軍兵營倉庫運出者。」

十一月十八號上午十點鐘，和我最好的一個義大利警官來看我。他顯然是很困惱的。他說了這麼些話：「我的親愛的范斯伯，現在我負着一種反叛我自己的任務。總領事加布勒里命令我通知你一個立刻執行的驅逐令。在半點鐘之內你必須到車站去準備搭十點四十五分的火車到上海。不許你對任何人說話或打電話，不過你可以告訴你的妻你有緊急事體就要到上海去，不要告訴她驅逐你的命令。我有命令，倘若你企圖通知任何人，就要你帶上手銬，由軍隊押解你到車站上。現在我的兵士都在那花園裏。我知道我此刻所作的事對於你是很不公道的，但是我必須盡我的職責，我希望你避免公開的侮辱，不要企圖拒捕，就算幫忙我吧。倘若承你答應我半點鐘之內到車站去，答應我在這時期內非經許可不通知任何人，那麼我就帶着衛士到車上去等你。」我除了接受這些條件而外無法可想。我答應了這可憐的人，而且我祇告訴我的妻我有要緊事到上海去。半點鐘之後我被關在一輛車裏面，其中有四個義國水兵和一個名叫羅馬諾里的小官。

十一月十九號我們到了上海，我立刻就被轉解到義大利軍艦蓋拉布里亞的密室裏。幸而艦長是一位誠實的義大利人。他立刻召我到他面前。我把我的困難情形告訴他，他就派一位軍官帶一封信給義國總領事洛西（*de Rossi*），聲明他不願假借義大利皇家軍艦給任何非正式的使用，除非在常天下午四點鐘他接到證明拘留我的正式公文，他就要開釋我。到四點零五分的時候，公文還不見來，我離開軍艦成爲自由人了。兩天以後義大利副領事費拉覺洛致函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當局請求拘捕蓋拉布里亞軍艦逃兵范斯伯。

公共租界的英國總巡，一個品性剛直的人，去訪問義大利總領事，並且聲明：倘若拘捕范斯伯的命令上貼着的相片真是所要拘捕的人的，那麼即刻就可以實行逮捕，因為范斯伯先生此刻正在總巡署裏，但是領事館必須塗掉「逃兵」字樣，因為據他知道范斯伯先生居留中國已經十五年了。反之，倘若要捕的是水兵，那就必須改換那錯誤的相片。中國當局也向義

大利公使提出抗議，然而得到的回答是范斯伯是義大利人，中政府並無關心范斯伯案的理由。這全部事件變成了當地報紙的通信材料，而天津義國領事館拒絕註銷驅逐令。因為要把事情弄明白，我和捕房商量之後，我自願被捕，因此被帶去見副領事費拉覺洛。在這些見證之前我質問費拉覺洛我犯了什麼罪，他不能回答。他含糊說是一種誤會，我被開釋了。

幾天之後我又被召去見那義國領事，他通知我義大利公使要我離開中國。發給我旅費，上船以後再給五千元。我謝絕了這提議。

一九二四年四月九號當我經過鄧脫路的時候，一個人刺了我胸上一刀就逃走了。中國當局相信行刺的是一個義大利退伍水兵。另一義大利人兩次企圖謀害我的生命，這人現在還住在上海。他的同謀者，三個俄國人和一個印度人，都已受了嚴重的處罰。那幾個俄國人受了哈爾濱中國法庭的裁判，那印度人受了哈爾濱英國法庭的裁判。

不久之後我回到哈爾濱，不幸我發覺我的本國當局使我難於得到一種正直的生活。於是採取了當時嫌惡而現在悔恨的決定，因為，由於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義大利的精神和官吏都改變了，以現在而論，這決定是不必要的。我變成了中國人民，我的保證人是北滿大員朱慶瀾將軍，魏永興將軍和姚志曾將軍。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就能夠毫無阻礙地和一切違法者爭鬥了。又有人要謀害我的生命，現在我把事後的報紙剪貼在這裏。

「哈埠謀殺間諜失敗」

謀刺范斯伯之印人被引渡

哈爾濱一月十二號特訊；上月謀刺本市無聲電影院大西洋股東兼總經理范斯伯之嫌疑犯印人巴爾辛一名，業已被捕，移交上海英國當局，但主謀之義人名萬多維洛士者仍逍遙法外。

此項陰謀發覺於去年十二月二十號，英領署立即請求中國警廳引渡巴爾辛，因其有同謀嫌疑被捕也。

據一般推測，葛多維洛士並未同時被捕，現在仍逍遙法外，殊可異云。回憶上海報載，范斯伯曾旅華多年與瀋陽特務處有顯要關係，該處對彼深資倚重，因其緝捕共產黨員及軍火私販甚爲得力故也。

此間衆信此種陰謀或因其服務瀋陽政府引起私人之仇恨。』

與白奴販賣者戰爭

作了張作霖的特務員，我回到哈爾濱之後，一切違法之徒，搗亂份子，私販，白奴販賣者以及流氓頭領全都向我公開宣戰，正如我向他們宣戰一樣。在布爾雪維克的威脅之下逃到遠東的一切俄國難民，其中百分之九十居留在滿洲，而這些人的十分之九是窮途末路的。像一些肉食的鳥類似的白奴販賣者降落在瀋陽，哈爾濱和別的城市裏，來捉捕他們所謂「在飢餓的恐怖中」的年輕貌美的婦女，把她們帶到更溫暖的國度去。作爲密探和警官，我是常和這種行幫接觸的，而其中最有力，最頑強，組織最完備，最富裕的是白俄貴族軍官所主持的一幫。我們所捕獲的全都由於法官受賄加以釋放了。白奴的真實底國王，和十年以前一樣，現在依然是那帝制派的俄國人。因爲證據確實他被捕過二十三次，由於繳納保銀他被釋放過二十三次，保銀有時達到二萬元或二萬五千元。

情形是這樣棘手，以至滿洲當局非採取非常手段對付他們，就得置之不理。治外法權是無數外國人幹這宗罪孽買賣的護身符。兩個瑞典人到哈爾濱一兩年之後就成爲滿洲的恐怖，後來在哈爾濱車站上被我的部下捉住了，那時他們正在護送六個體面的女子到天津去作「太太」。因爲知道合法手續的無效，我的部下奉命把他們帶到鐵道區的邊界，勒死在一棵電報柱上。

一九二六年，一個衣冠整肅的法國人包了哈爾濱馬狄爾飯店的兩個最好的房間，來到不

久他就任各種報紙上登出廣告，徵求年齡在十八至二十二之間的打字員，報酬優厚云云。我叫幾個密探監視着他，據報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差不多有二十多人來請求工作，而且他發給認為合格的各人二十元。我親自去見這法國人，而且發見他就要離開這飯店了。我告訴他我有兩個女兒很想得到適當的職業，在我沒有把她們帶來見他之前我願意知道這職業是否高尚和報酬是否合算。那法國人把我打量了一下，問我是否知道他是什麼人。他說：『我是上海法租界的秘書，我要雇一些打字員到我們的工部局裏去工作。』（其實，後來證明他和法租界毫無關係。）

『但是我的女兒不懂法文，』我說。

『這不要緊。上海法租界裏有二萬多俄國人，所以，在我們的行政上說俄國話的人比說法國話的人更有用。』

『很好，』我說，而且我也把他打量了一下。這正是我要知道的。『這是我的名片。倘若你不搭今晚九點鐘的火車離開哈爾濱，那麼你也就不要想活下去了。我不必提醒你過去有許多白奴販賣者毫無踪跡地不見了。』那法國人當晚就走了……並不會帶去任何打字員。

日本人纔一佔領滿洲，我和白奴販賣者的戰爭就立刻停止了。作了日本人的特務員（註：那時我被迫加入日本的特務機關，將來還要說明（見第三章））。我不能不睜眼看着我的上司由於批准開

設妓院和人肉輸出『集中營』而得到大宗收入。在佔領的前幾天，我的部下在齊齊哈爾車站上聽見停在避道上的一輛貨車裏面有哭聲，打開車門就發見其中有一個叫作盧森伯的俄國婦人和十一個俄國女孩子，年紀都不過十六歲，其中兩個已經凍死了。這婦人用幾塊錢把他們買來，打算把她帶到天津去。當夜這婦人被看守她的獄卒絞死在關她的牢房裏。看着這婦人利用她的同胞的貧困，那血腥是更難忍受的，而處置她的那中國人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或者這是我對於我自己的一種解釋吧。第二天並無問題……我自己尤其不問。

我的頂好的上司——張作霖

前兩節已經說過，自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四號以來，我在頂好的上司張作霖大帥之下爲了法律與秩序用不合式的武器鬧過一番了。張作霖於一八七六年生於南滿洲的奉天省海城縣。他的青年時代的故事幾乎近於神話，甚至有這樣的傳說：有一次他跑到縣知事衙門裏，責罵他欺壓窮人，把縣官的許多部屬兵丁駭得目瞪口呆，就在這時候張獨自判定縣官該死。張執行了這判決，在衆人還在驚疑不定之前溜走了。

在日俄戰爭中，張作霖加入日方工作，破壞俄國的交通線。他的工作被日本人所讚賞是由這事實可以證明的：戰爭完結之後日本人就使北京的清廷完全赦免了他，以至後來榮任奉天省的行政長官。從那時起，就開始了滿洲的進步和張作霖自己的高升。在一九二二年中他終於初次離開滿洲去指揮北京附近的戰爭。然而他的軍隊被吳佩孚的軍隊打敗了，於是他退回滿洲，宣佈東三省獨立。他是一個卓越的行政官，一個無情的獨斷家。他並沒有受過教育，他的成就由於他的異常聰明和非凡的記憶力。張作霖使滿洲農民生活比之隣近各省的以及高麗的甚至俄國的農民生活都更爲快活。以至祇有一千萬人口的滿洲（其中祇五十萬是土著）到他死的時候就變爲三千萬人口的富庶之區了。每年都有成千成萬的中國人甚至別種人來到滿洲幫忙收穫，並且定居在那裏。他的猛鷲的性格有許多例子，可以引證之一是他處置當地操縱紙幣的銀行錢莊經理的辦法。九個經理被邀請到瀋陽開會，到了之後張作霖給他們一番演說，那簡單直率是可以成爲世界紀錄的。他說：『我明白，你們也一定明白，你們操縱錢票布價，發了大財，害死許多農民和商人。從前我警告過你們，要你們負責任，而你們不負責任，那麼現在聽我說吧。倘若處於你們的地位你們不能制止這種投機，那麼你們是無能的，倘若你們能夠制止而不願制止，那麼你們是錯的。不論是那種情形，你們都該死。』

五分鐘之後九個銀行家的頭顱就落在張作霖的庭院的地上。

許多年以來張大帥一貫地作弄日本人到底，有許多回他利用他們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廿二號郭松齡發了一個中國政客們所喜歡的通電。要求張大帥下野，理由是郭自己發明的。同時他派軍隊越過長城向瀋陽進犯。那些軍隊是精良的，而張大帥的衛隊毫無準備。六月（註：疑係一月之誤——譯者。）十八號，郭將軍已經逼近瀋陽了。張大帥並不含糊，他慫恿日本人加強瀋陽鐵路地帶的防務，並且使他們宣佈郭軍不得進至南滿路二十里以內。這就是說瀋陽得救了。幾天之後張大帥重新整頓和配備了他的軍隊，並且把中國軍制服發給一整個日本師團的兵士，發令攻擊郭軍，得到完全勝利。郭將軍和他的妻都被俘獲，即刻處死。

一九二六年張大帥在日本人鼓勵之下進駐北京，在那裏住了兩年。然而，這時國民黨軍隊已經風靡全中國。最初是由共產黨領導，後來是在蔣介石將軍的能幹的指揮之下，他們達到了濟南。在這裏蔣將軍的軍隊被日本所阻止，那時日軍佔領着膠濟路。不過，張大帥看見風勢不順，所以急於想要回滿洲去，張大帥的最可靠最老的朋友吳俊陞，那時負着東三省的全責的，也催促他回去。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號駐在北京的日本公使警告張大帥不要回滿洲。這或許是使張大帥於五月廿六號突然決定乘車回瀋陽的直接原因。

五月三十一號，張大帥的駐東京的密探豬心先生（Mr. Swineheart）火急警告他不可乘車到瀋陽，因為他得到某種情報，說是張要在中途被刺。雖然大帥不信這謠言，他却把地告訴日軍司令部的某大佐。大佐微笑答道並無可慮之處，他自己願意和大帥同坐在一輛車到瀋陽去。我也坐在於六月二號半夜由北京開出和斷送大帥生命的那列車裏面，但是到天津的時候我必須下去調查某些問題。六月四號日本軍事實局邀請吳俊陞將軍到瀋陽以南二十公里的一個車站上去會晤張大帥。吳將軍去了，帶着他的幾個僚屬，而且從那裏和大帥同車回瀋陽，列車要到瀋陽的十分鐘之前，那位履行約言伴隨大帥同車回瀋的日本大佐就站起來說要